

容闳的中国梦

/ 赵映林

被誉为“留学生之父”、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首个“海归”——容闳，有一个中国梦，那就是实现中国教育的近代化。1855年，深爱自己祖国的他就是怀揣着这样的憧憬回到国内的。

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南屏乡（今珠海市南屏镇）人，由于贫困，家里无钱供他上学，在他7岁那年，被父亲送到了学费杂费全免的澳门洋学堂。校长是德籍传教士郭士立的夫人温斯娣。让人感叹的是，这所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和鸦片战争挑起者查顿募资修建的，历史的诡异常在一些不经意处反映出来。1841年秋，容闳进入布朗教士负责的马礼逊学校。1846年，容闳跟随布朗到了美国，进了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城学校。3年后，容闳在美国慈善组织的资助下，进入耶鲁大学，4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容闳成为耶鲁大学历史上第一个毕业的中国留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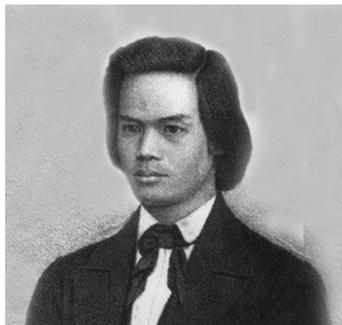
容闳缘何得以实现中国梦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的洋枪洋炮将国人中

其中梅花的花蕊是纯金制成，花朵和枝叶则是银质，十分鲜艳夺目。日本政府送的一只花圈，则是纯银制作。印度政府送的是一对银质小象，分别装在两只红木玻璃匣中，小象高一尺有余，一只卷鼻朝天，一只垂鼻低头，可爱至极；每只象的腿上还挂有小牌一个，上书“太平有象”4字。类似的珍贵礼品还有不少。

奉安大典结束后，这些礼品都暂时放在南京石板桥2号孙中山葬事筹备处的办公处保存，也就是林森的官邸。在陵园管理委员会首次会议上，林森提议将小茅山顶的万福寺进行整修，专门作为保存纪念物品的地方。之后，万福寺就成为奉安纪念馆。馆内先后存放了纪念孙中山的物品240多件，除了金银铜器外，还有瓷器、丝绸、土产、雕刻等珍贵纪念物。但奉安纪念馆设在山上，交通很不方便，陵管会遂决定将明孝陵四方城附近的中山陵园管理处旧址，辟为奉安纪念馆。但迁移尚未

的以魏源、姚莹、徐继畲等为代表的少数知识分子和极少数官员如林则徐等惊醒，遂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不过，当年这还仅仅停留在极少数文人的思想与口头上，离实际运作早着呢！因为此时此刻的中国依旧是



1854年容闳获美国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像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朝廷到民众根本就没有接纳“师夷长技”的任何心理准备。可是，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把火，烧掉了那号称“世界园林之园”的圆明园，朝野上下惊呼“夷祸之烈极矣”，这才有了中央官员、封疆大吏以及地方官员的众多幕僚，开始思考如何将“师夷长技以制夷”付诸实际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容闳回国了。

完成，万福寺即在南京沦陷时毁于日军炮火，许多珍贵物品不知去向。

1933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举行了“中山文化教育馆”成立典礼，林森主持了会议并致辞。会议还推选林森、蒋介石、胡汉民、蔡元培、于右任、孙科为理事长，并决定在陵园内择地建设中山文化教育馆。该建筑由著名建筑师赵深设计，张裕泰营造厂承建，至1935年1月竣工，也在日军攻占南京时被毁。

另一座两层建筑“桂林石屋”，在中山陵东侧的密林深处，是由广东省政府和民间在林森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后，专门捐资为他所建。建筑全部采用南京青龙山石料，还将明故宫的一些废弃石刻嵌入其中，造型极其精致，可惜也被日军所毁。

责任编辑 赵晓帆

“海归”之初，容闳因与洪秀全之族弟洪仁玕是香港的旧相识，曾将中国梦的实现寄托在洪仁玕与太平天国身上，为此，1860年容闳专程来到南京访问过太平天国，直到次年初才离开，前后40天。在与太平天国“干王”“精忠军师”“总理朝政”的洪仁玕晤谈中，容闳提出了7条建议：

按照科学原则组建军队；创办武备学堂（陆军学校）以培养有才干的军官；创办水师学堂（海军学校）以培养海军；组织文官政府（平民政府），由有才智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建立银行体系（金融制度），厘定度量衡标准；为国民建立各级学校教育体系，把《圣经》作为教科书之一；建立一整套实业学校体系。

容闳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洪仁玕在香港也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润，对容闳的建议，洪仁玕十分赞赏，因为容闳的建议与自己的《资政新篇》内容大同小异，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此后几天中，容闳与洪仁玕还就这7条作过认真探讨。可惜的是太平天国经历了1856年的“内讧”之后，洪秀全早已没有点滴向上的进取心了，不要说一个“海归”的建议，即使是族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也都被束之高阁。对此，容闳只能不无遗憾地说：“干王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比其他诸王或将甚至洪秀全本人更有见识。他了解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的强盛的奥秘所在，因此完全懂得这些建议的至关重要性和确切意义。但他只是一个人，没有人支持他，以拥护这些建议的实施。”容闳的中国梦首次碰了壁。

虽然容闳的建议不能被太平天国所接受，可洪仁玕还是极力挽留容闳，希望其能留在天京与他们共命运，同创大业。洪仁玕封容闳以官爵，容闳婉拒了。他对洪仁玕说：只要太平军的领袖们决定实施我提出的建议，不管是其中一条或全部内容，只要需要我为之尽力的，那我都将极为乐意地为之效力。遗憾的是太平天国以“新瓶装老酒”，借用西方基督教号召穷苦百姓为之推翻清王朝，岂会推行近代西方所谓的“平民政府”？洪秀全怎么可能接受容闳这些建议呢？

与太平天国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曾国藩对西学的重视，思贤若渴，对认知外部世界的渴望。容闳于1863年9月来到安庆，正式加入曾国藩幕府，努力推动曾国藩兴办洋务。容闳投身洋务新政，可谓是水到渠成，从此使他的人生历程丰富多彩，留名青史。他凭借曾国藩提供的舞台，有了施展身手之处，从而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如无曾国藩，容闳很可能以经商而



（左）曾国藩（1811—1872）（右）恭亲王奕訢（1833—1898）

了此一生，正是有了曾国藩，容闳才得以将自己的中国梦付诸实践，而为后世誉为“中国留学之父”；另一方面，由于容闳，曾国藩成为晚清兴办洋务的第一人、奠基者与领军人物。

第一个提出创办制造机器之工厂

国家内忧外患的局势，加之曾国藩的远见卓识，容闳有了用武之地。1861年，曾国藩即以“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的原则下，与徐寿、华衡芳、李善兰等人积极谋划，创设了安庆内军械所，试制枪炮和船只。容闳来后并没有立即建议曾国藩上书朝廷选派幼童出国留学，他很明白曾国藩此时的当务之急是要制造洋枪洋炮，解决燃眉之急，只有等到曾切实认识到选派幼童出国留学的重要性后，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教育梦。所以，他首先按照曾的需求提出自己的第一步建议，这就是自置机器，向国外购买“制器之器”以设厂制造机器，而不仅仅只是建造船炮，还可以造其他器物。容闳说：“我以为目前中国需要建立的应是通用和基础性的而不宜专以特种用途的机器厂。也就是说，应该建立的机器厂是本身能够创造或再生产出许多同类性质的机器厂；每个和所有这些机器厂又能够生产特种机器以制造专门或具体的物件。”他向曾国藩及其部下介绍说：我们“应建立通用和基础性的机器厂以便制造特种机器。一个机器厂包括不同类型和型号的车床、刨床和钻床，它能生产出用以制造枪炮、发动机、农业机械和钟表等等的机器。”他进一步向曾国藩解释：“假若中国拥有许多这样精良的机器厂，那么必要时就能够使这些机器厂相互间分工合作。而且国内的劳动力和原材料都比欧美国家低廉。”容闳很早就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最初优势在何处——人口红利是不可忽视的。

曾国藩大为欣赏，采纳了容闳的建议，决定在中

国创办能够“生产机器”的机器厂。曾当即指示容闳与安庆内军械所徐寿、华衡芳等人商讨具体要求，筹划具体方案，还给容闳签发任命书，授予五品军功的头衔，派容闳全权负责创设“制造机器”的新式通用机器局，并出洋采购能够“生产机器之机器”。1863年10月，容闳前往美国采购机器设备。

1865年，容闳在美国所采购的机器设备运至上海，江苏巡抚李鸿章命与上海已有的设备合并为江南制造总局，又称江南铁厂。最初地址设在今上海虹口区九龙路、溧阳路沿江一带。容闳协助总负责局务的江苏藩司、（后升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拟订出江南制造总局经营章程，其内容包括：将原有洋匠留用8人，裁撤滥等充数的洋人，指定技术过硬的西洋匠人科尔为匠目（技工领班头目），负责全局工程技术之责；选派国内年轻工人随其学习，如技能达到与洋人同样水平，享受与洋人同等薪金，如技术再能提高，则提升为匠目，等等。次年又在今南京设金陵制造局（今中航集团南京晨光集团前身）。看到产品源源不断地从工厂生产出来，时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喜不自禁。为了培养人才，容闳建议并经曾国藩批准，在江南制造局设立兵工（机械）学校，培养了一批各种类型的机械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洋务运动中产生的首批工程技术人员就是来自于容闳建议、经曾国藩批准创办的这所新式学校。

洋务运动兴起之初，主要内容就是造船、造炮，当时称之为“自强新政”。江南制造局建成后，限于财力，先以制造枪炮军械为主，修造轮船为辅。发展后又将江南制造总局分成5个分厂：一是制造枪炮的军火工厂；二是制造轮船和修理船舶的船厂；三是炼钢厂；四是火药厂；五是机器制造厂。同时，附设翻译馆译述印刷出版外国书籍。江南制造总局占地700余亩，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军事工厂。随着发展，该企业又从虹口迁至高昌庙，规模更大了，发展到13个分厂，厂房2500余间，技术工人和职员达3500多人，“制器之器”（工作母机）有662台，真正实现了容闳最初设想的要有自己的“能够制造机器的机器”。

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开始造船，第二年第一艘轮船竣工，船体与锅炉完全自制，蒸汽机则购之国外。船长185尺，宽27尺，吃水8尺，动力达到392匹马力，时速上水35里，下水60里。9月15日，轮船在高昌庙黄浦江下水试航，经吴淞口，进入东海，到达舟山群岛后返回。据当时的《教会新报》报道，观看试航的“上海军民无不欣喜”。9月28日，兵船驶抵南京，曾国藩亲自命名为“恬吉”，并邀请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一

同登船，从下关驶向安徽采石矶，来回180里。曾国藩兴奋不已，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

1868年，在容闳的建议下，组织了华股合资汽船公司，开矿产和修铁路，他还向曾国藩提出，禁止外国教会干涉中国词讼等。

但是，容闳更大的中国梦是办学从事教育，推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实现教育救国，这是他回国前立下的志向。容闳认为中国现时不论干什么，最缺乏的是人才。他曾想借太平天国实现自己的理想，没有能够成功，现在随着兴办军工企业的成功，他觉得说动曾国藩、推动中国幼童出国留学计划的时机已经成熟。

实现幼童出洋留学

实现中国幼童出洋留学，这是容闳于洋务运动的第二大贡献，更是他回国要努力实现的中国梦。由于曾国藩的信任，大大鼓舞了容闳，隐藏在他心中的一个更宏伟的教育计划此时也就呼之欲出了。在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全力支持下，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国幼童出国留学计划，在容闳的推进力主之下终于有了结果。

丁日昌以藩司身份兼理过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非常欣赏容闳，此时对容闳提出的留学计划鼎力支持。容闳由于曾国藩的保举，清廷特授他五品实官，明令“以候补同知，指省江苏，尽先补用”。容闳虽然有了“副地市级”的官品，可还没有向朝廷上书的资格。所以，他的幼童出国留学开始只能以丁日昌的名义上奏。

1867年，容闳提出4条建议：

组织轮船股份公司，不准许外国人做股东。

政府选派120名优秀幼童出洋留学，分为4批，每批30人。

政府开采矿产。

禁止任何教会或派别的传教士干涉中国司法。

在这4条建议中，第一、三、四条都是陪衬，容闳真正关心的是第二条——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容闳说“它牵动着我的心，是最渴望被采纳的一条”。既然如此，直截了当只提第二条不就得了吗？原来，在中国官场，上级批复公事，下级的要求总要遭受折扣，许多建议会被驳回，4条建议中，第一、三、四条实现难度较大，这几条如被驳回，第二条留学建议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就大。容闳根据《中美续增条约》载明互相优待学生的条款，提出可选派12—14岁的幼童送往美国留学。为了有把握，丁日昌商之于曾国藩，决定由曾国

藩正式上奏，并与李鸿章联名。此举在中央得到了恭亲王奕訢的大力支持。即使如此，容闳的派遣幼童出洋留学建议仍然拖到 1871 年获得正式批准。

从 1854 年容闳由耶鲁大学毕业，次年回国，抱着教育救国的宗旨一心想报效祖国；到 1871 年，整整 17 年。期间，为了促成这一“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容闳不断努力、等待，再努力、再等待，从 26 岁等到 43 岁，甘苦自知。不过，总算有了结果。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容闳的幼童出洋留学计划得以被朝廷批准，竟然是缘于 1870 年的“天津教案”。正是由于“天津教案”，使得“外交”和“自强”两件大事变得重要和突出起来。否则，只怕还得等待、再等待。

1871 年 9 月 9 日，幼童出洋留学计划终于获得批准办理的圣旨，容闳的中国梦终于成为现实。几千年的古老书桌在容闳倡导、操作下，在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以及恭亲王奕訢等人的力主下，终于被搬动了。李鸿章说过，中国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促进中国改变“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最大撬动力就是源于容闳此举。纵观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最深远的。

之后，容闳受命在上海设立“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首招幼童 30 名。又在美国康涅狄州的哈特福德设立办事处，总揽幼童到美后的一切事务。翰林出身的原刑部主事陈兰彬被任命为该局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专门负责选派幼童留学与监督留学计划的实施。1872

1872 年，抵达旧金山的部分留学幼童合影。



晚年容闳

年 9 月中旬，中国第一批幼童留学生抵达大洋彼岸的美国旧金山，《纽约时报》报道说：“昨天到达的 30 位中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都是勤奋而优秀的小姐和先生，并且外表比从前到访美国的同胞更加整洁。”报道还说，“他们受到了美国人民的极大关注”。对此，国内的报纸也曾作了报道。从 1872 到 1875 年一共 4 批 120 名幼童出洋留学，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最为世人熟知的詹天佑、唐绍仪就是这一时期的幼童留学生。

遗憾的是，这一对中国历史进程将会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史无前例的壮举，随着曾国藩的去世，李鸿章独力支持，孤掌难鸣，终不敌朝廷中的顽固势力。保守势力斥责留美学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力主撤回。虽经容闳、李鸿章全力以争，仍无法回天。1881 年，容闳以半生精力促成的中国幼童出洋留学事业，在中国的守旧势力反对下半途而废，让人扼腕叹息。近百名或将完成全部高中学业，或即将在美国各著名大学毕业的留学生，不得不挥手告别那些代表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大学，洒泪登船，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获得耶鲁大学学位。

这批留学生被迫提前回国，虽然大多没有毕业，取得学位，但他们毕竟获得了新知识、新方法，具有了新思维、新视野，已完全不同于传统儒学培育出来的土子了。被召回的幼童后来又有部分出国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他们回国后，大多任职外交、海关、海军、路矿与其他洋务机关，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各领域的中坚人物。如蔡绍基任北洋大学校长，钟文耀任沪宁铁路总办，吴仰曾任开平矿务局副局长，梁敦彦任清政府外务大臣，刘玉麟任清政府驻英公使，宋文翔任海军“广甲”舰大副，后任海军司令……

随着历史的前进步伐，容闳筚路蓝缕开启的出国留学之路，在 40 年后终被赓续。1912 年，曾是第四批留美幼童的梁诚在驻美公使任上，成功敦促美国返还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创办清华学校，考选优秀学子赴美留学，其分期分批、定额定时的培养模式，仍是参照容闳制定的留学章程。而任清华学校校长的唐国安，就是第二批留美幼童。在享受庚子赔款留学生中，很多人在 1949 年后回到祖国，报效国家。新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巨大成就，几无不留下他们的印迹。

责任编辑 齐玉东